

· 徽学研究 ·

尝试性分业与阶段性继业

——《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所见典当资本继承方式研究

郑小娟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反映的对典当资本的析分当为一次尝试性的分业。出现了尝试性分业和整体上表现为阶段性继业是程虚宇家族在典当资本继承方式上的显著特点。之所以导致采取这种资本继承方式,既有普遍性的因素,也有程家自身的原因。程虚宇在分业中严格遵守诸子均分精神,这由析分中坚持的三个主要原则表现出来。

关键词: 徽商; 典当; 资本; 分业

中图分类号: K248;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08)02-0099-05

The trying with the partition of property and succeeding step by step

—— the study on the way of succeeding with the pawn capital which could be found in “ the Xiuning Cheng xu-yu ’s matter about the partition in Chongzhen emperor two year ”

ZHENG Xiao-j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partition of property is trying, which we could found in “ the Xiuning Cheng xu-yu ’s matter about the partition in Chongzhen emperor two year ”. The trying and succeeding step by step to the pawn capital is characteristic of Cheng xu-yu ’s family. There are general reasons and peculiar ones. Cheng xu-yu divided the capital like an equalitarian. As a result, we could found three rules.

Key words: Hui merchants; pawn; capital; partition

在中国社科院收藏的徽商原始资料中,有一则《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下简称《立分书》),反映了徽州典商程虚宇家族财产析分、继承以及典当经营的一些具体情况,这对于研究明清时期富有盛名的徽商典当业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围绕着这份文书,栾成显、汪崇筑两先生都做比较系统的研究,形成的结论对后来者都颇具启发意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拟就这份文书所反映的典当资本的继承方式问题稍抒几点个人的见解。看法不一定成熟,欠妥之处,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一、崇祯二年程虚宇析分典当资本当为尝试性分业

崇祯二年,徽州典商程虚宇将名下财产在三个儿子孟、仲、季三房之间进行析分。按《立分书》中所载,程虚宇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来析分,而是留有一部分,

正如他所说的:“外存贻本、产业、物件,以备吾用。日后所有剩余,以作三分常贻。”(《自叙》)在这次财产析分中,程氏对于典当资本的做法值得我们注意,本文即以此为中心展开下述讨论。

《立分书》中有各房“实授本银并铺基”一项,载明了三房在崇祯二年所得到的资本的数量、组成情况和存贮地。如下所示:

孟房实授本银并铺基:

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8,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栾成显:《明末典业徽商一例: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研究》,《徽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汪崇筑:《徽州典当资本的增值:以程虚宇家族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一分授本银壹万两

一还附本利银贰万柒仟陆伯捌拾壹两贰钱贰分

一找贴银壹仟伍伯玖拾两

三共银叁万玖仟贰伯柒拾壹两贰钱贰分

一坐安庆绣衣坊铺典本在银壹万零陆拾贰两零捌分贰厘

一坐安庆绣衣坊铺屋地银伍伯两

一坐黄州府前铺典本在银柒仟柒伯柒拾玖两陆钱陆分四厘

一坐广济孝义坊铺典本在银捌仟柒伯伍拾捌两捌钱四分贰厘

一坐安庆枞阳门铺典本在银柒仟玖伯叁拾贰两壹钱柒分柒厘

一坐家中铺典本在银肆仟贰伯叁拾捌两四钱五分五厘

六共银叁万玖仟贰伯柒拾壹两贰钱贰分

仲房实授本银并铺基:

一分授本银壹万两

一还附本利银壹万陆仟壹伯零贰两叁钱陆分四厘

二共银贰万陆仟壹伯零贰两叁钱陆分四厘

一坐安庆府巷口铺典本在银壹万壹仟壹伯贰拾肆两伍钱贰分贰厘

一坐楚省察院坡铺典本在银壹万壹仟肆伯陆拾壹两伍钱壹分捌厘

一坐家中铺典本在银贰仟柒伯壹拾陆两叁钱贰分四厘

三共银贰万陆仟壹伯零贰两叁钱陆分四厘

季房实授本银并铺基:

一分授本银壹万两

一还附本利银伍仟捌伯壹拾贰两陆钱玖分壹厘

一贴银壹仟两

三共银壹万陆仟捌伯壹拾贰两陆钱玖分壹厘

一坐九江府前铺典本在银壹万叁仟肆伯柒拾壹两四钱叁分四厘

一坐家中铺典本在银叁仟叁伯肆拾壹两贰钱伍分柒厘

二共银壹万陆仟捌伯壹拾贰两陆钱玖分壹厘

以上所列各房的“实授本银并铺基”，其“实授本银”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分授本银”(此次均分给各房的本银，各房均为 10000 两)，“还附本利银”(即各房原有的梯己银)，“贴银”(因平时参与管理家务而得到的补贴)；“铺基”一项，则是列出各房典本所属典铺的坐落地址、名称，及各房拥有该典铺“典本在银”(铺中现存资本)的数字。这个数字正好和“实授本银”的数字相等，表明了分给各房的本银贮存在何方。

就三房所得本银数字而言，孟房为 39271.22 两，仲房为 26102.364 两，季房为 16812.691 两，三房合计为 82186.275 两。栾成显先生曾根据这个合计数，指出程虚宇本家拥有的典当资本数为 80000 余两。这种说法恐怕是大大低估了程家的典当资本数额。因为从 80000 余两本银的组成情况看，其中只有 32000 余两是程虚宇作为父亲给的，剩余的 50000 余两是原来就属于孟、仲、季三房自己的梯己银。其组成主要为“送日子银”、“大婚递手银”之类的长辈或亲友赠送的礼俗银两)。也就是说，程虚宇这次只是从自己名下拿出了 32000 余两本银分给儿子们。其数量和孟、仲、季三房原有的梯己银相比尚少得多，当然不应该是程虚宇名下的资本总量，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么，程虚宇名下的典当资本有多少？按照《立分书》可做一个大致的估计。《自叙》中的这段话已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今……外余安庆、九江、广济、黄州、湖广七典，每各分授本银壹万两。”人们认为，这句话反映了程虚宇家庭除了在本村开办典铺外，还在安庆、九江、广济、黄州、湖广等外地开设了七家典铺。在崇祯二年财产分割时，程虚宇向外地的七家典铺各分授本银 10000 两。七典各给银 10000 两，合计就有银 70000 两。这笔钱应该是程虚宇在资产清理后用于“众存”的，暂不析分。加上他拿出析分的 32000 多两，他名下的典当资本已有 102000 两之多。而这还不是全部。在文书的《跋》中，程虚宇指出：“所有众存贳物、田园及本村典当递年花利，尽为养老之需，日后俱作常稔。”这样看来，在本村典铺的资本中，他仍然留有一部分没有析分，具体有多少不好说。粗估下来，程虚宇名下的典当资本量至少应有 10 余万两白银之多。

按此数目，在崇祯二年，程虚宇只是把其中的三分之一略少部分析分给了后人，大部分仍然留在了自己手中。这样的分业，可看作是一种尝试性的行为。即只拿出少量资本传授给下一代，这部分资本和儿子们自有的梯己银一起，为他们学习理财搭建起一个平台。今后，父亲再选择适当的时机把剩余的大部分资本交给儿子们。当然，不管以后是一次性转交还是逐步转交，对儿子们来讲，他们是在阶段性地继承父业。所以，如果要概括程虚宇家庭典当资本继承方式的特点的话，那么，出现了尝试性分业和整体上表现为阶段性继业，可谓突出的两个方面。

二、程虚宇兄弟继承其父典当资本的阶段性

这样的特点，也反映在由程虚宇描述的、他们兄弟继

范金民、夏维中：《明清徽州典商述略》，《徽学》第 2 卷，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承父业的过程中。程虚宇兄弟的父亲松墩公是分阶段地把自己的典当资本传给儿子们的。由下面的记载不难看出这一点,即:

己丑,予年三旬有七,父将母亲奩仪及外祖所惠货物生息等件总计谅批本利,与胞弟各授银肆千两;祖父历年所与银物、岳翁所附本银及嫁次妹所用金银饰等件,共谅批本利银壹千两。二项俱坐楚省察院坡铺生息。

丙申,予年四旬有四,众各分析得受父分贲本银五千两,坐黄州府前铺生息。

二铺历年出入,俱系胞弟代为结算。一切产业,俱照分受闾管业。

至丁酉,父念予自少至壮,未掌利权,不避寒暑,代劳任怨,以致家声日振,贲产渐饶。有所储积,以分析于各房。于是将安庆绣衣坊铺内批与银壹千叁佰两。

这段记载见于《立分书》的《跋》中。己丑为万历十七年,是年程虚宇和两个胞弟各从父亲那里得到典当资本银4000两,这是他父亲的第一次分业。《自叙》中提到此节时说“先君谅批均分于予与次弟两人,余皆众存生息”。这容易引起误解。参照《率东程氏家谱》,程虚宇共兄弟三人,他为长子,由此则“予与次弟两人”所说的是三个人。按三人均分,每人4000两,则松墩公拿来析分的本银有12000两。和以后析分的数目相对比,其只是少数。仅析分了少量的资本,尝试性分业的特点可谓明显。

至丙申即万历二十四年,程虚宇兄弟三人又各得到父亲析分的典当资本5000两,这是第二次分业,松墩公这次拿来析分的是15000两本银。

截止到第二次财产析分,松墩公也并没有把所有的典当资本都分给儿子们。比如,有一部分资本是“外存本村河西当铺,轮管生息”(《自叙》),即由程虚宇兄弟轮流管理。一年后,松墩公就去世了。而在他去世的20年后,即丁巳也就是万历四十五年,程虚宇与弟、侄可能此时有一胞弟已去世)同至安庆绣衣坊典铺,在这里各分银2000两。分银相同,表明他们是在均分父亲留下的财产,也就是这部分本银当松墩公在世时也未析分。

这样看来,程虚宇兄弟在继承其父的典当资本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分阶段性。

松墩公在析分典当资本的过程中,即注意把儿子们,也就是各房所附本利算明,“批还完足”;也注意根据劳绩发放补贴。就程虚宇的情况而言,在万历十七年,属于他的本利合计约1000两的梯己银被父亲“谅批”给他,该银当时存在楚省察院坡铺生利;至万历二十五年,父亲又从安庆绣衣坊铺中批银1300两,按程虚宇本人的话来讲这是“念予十三载勤劬,以旌予劳”,就是因多年参与管理家务而得到的补贴。将程虚宇和他的父亲松墩公这两代人的做法相对比,不难看出,两者是何其类似。

三、典商程虚宇家族实行尝试性分业与阶段性继业的原因

程虚宇和他的父亲松墩公,都是自己健在的时候诸子即已成家立业,而且此后父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都较长。这样,就为他们实行尝试性分业,逐步分阶段地向儿子们转移名下的财产提供了条件。若不具备这种条件,想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典商程虚宇家族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作为父亲,总希望儿子在完全接手家业前,通过由浅入深、由易而难的逐步尝试,多积累理财经验,培养起一定的理财能力。这样,在自己去世后,家业不致于被轻易败尽。而典当业务本身的复杂性也进一步增加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对于典当业务的复杂性,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到的:就专业知识而言,可能经营典铺的要求是最高的。典物成千上万,举凡绸缎布匹、裙袄裤褂、金银首饰、古玩彝器、法书名画、日用百货等,无所不包。要把握这些林林总总物件的产地、规格、特征、时价、成色、质量,然后作出准确的判断,实非易事,非经专业训练,不是见多识广,是断难胜任的。而这样的专业要求,只有那些长期业当者才能胜任。

作为典商的儿子,往往是能较早地参与自家典铺的管理的。比如在程虚宇这一辈,两个胞弟当松墩公健在时便长期经管典铺。程虚宇本人,虽然说是在父亲去世前因“习儒”而“未遑经理贾事”,但也不是不能管理典铺。万历二十五年,其父曾命他掌管本村的河西典铺,因精力所限,他掌管了一年后便“算明结帐”,交诸弟经营。在程虚宇的三个儿子中,长子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管理内外家事20年,也曾掌管本村的河西典铺;三子也参与家务管理,据称“训习经理”。只有次子在“习博士家业”,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但是,通过管理劳动而获取报酬和通过提供典当资本食利,并不是一回事。作为典商的父亲,在把儿子培养为典铺管理成员的同时,尝试性地、分阶段地把自己名下的典当资本拨付到儿子名下,让他们掌管生息,能够敦促他们去了解典当经营的规律、熟悉典当业务,这对于自家典铺未来的发展显然是有利的。

第二方面的因素,则要立足于分家析产这一遗产继

参见栾成显:《明末典业徽商一例: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研究》,《徽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见范金民、夏维中:《明清徽州典商述略》,《徽学》第2卷。

承制度本身来谈了。按照通常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实行的诸子均分遗产制,对于商业资本、生息资本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一代人积累起来的资本会被分割,这不利于资本的扩大,下一代人不得不在更低的基础上来发展,来积累资本,实际就降低了经营能力。这种观点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问题可能比这个更为复杂。资本经营好坏实际不单取决于资本总量的多少,也取决于经营管理者的能力和付出的劳动。对于一个家族而言,如果从整体上考虑,因部分经营管理者的良好能力和所付出的劳动而得到的价值增益,大于因其资本减持而造成的收益减少,那么,这个家族析分资本带来的应该就是效率的提高。若每一代人出现的都是这种正效应,那么,这个家族的资本经营及发展就会呈现出枝繁叶茂,从整体上做大做强。程虚宇所属的率东程氏家族就是这样。在这个家族的发展过程中,“子稍长即分爨”的特点明显,但家族的资本规模却应是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由《率东程氏家谱》可见,率东程氏以静翁公程观保为始祖,但其资产尚不丰裕,家有田一顷,余资不足一金。自第二世程维宗时开始家业暴发,“居商贾之货”,有田产4000亩,家资丰盈,人称“税粮冠于一县”。此后,率东程氏子孙蕃息,传至程虚宇已是第9世。在他之前,族人中以擅长经商而著称者已比比皆是,如:程宪(第六世):“修父业商于淮浙间,贸迁有道,虽老于商者莫之及也,以故资雄于乡,为邑望族。”程莹(第六世):“从事乎商,寓湖州之双林市……操纵综理之周,出纳平准之宜,井井有条而不紊,不舞智以笼人,不专利以取怨,人皆服公之材干,公平用能,丰殖货利,而业益裕焉。”程珣(第七世):“经商于浙乌程、平湖,‘多开典肆’;‘公虽擅雄资,然蹈道守礼,不为侈靡’。”程钺(第七世):“南游吴越,吴越之人喜其忠信,遐迩归心。夙夜懋迁,遂获奇赢。置田拓址,雄于一乡矣。”程锁(第七世):“服贾起家,累钜万”。其“中年客溧水,其俗春出母钱贷下户,秋倍收子钱。长公(程锁)居息市中,终岁不过什一,细民称便,争赴长公……长公乃部署门下客,分地而居息吴越间”。等等。

可见,分家析产并没有阻止率东程氏家族的资本积累与发展,而是导致他们以一种蔓延式的树状结构在发展扩大,其整个家族的资本总量也随着这种扩大在不断增加。若从第二世程维宗以降财产不做析分,家族的资本总量规模也未必会比这样更大。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来看实行尝试性分业和阶段性继业的好处。首先,这样做显然使得诸子分家析产变得更为理性,可谓“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析产,它使家庭因析产而带来的负效应被后人能力提高而带来的正效应抵消的可能性增大了。其次,这会导致较早建立一种激励机制。我们由程虚宇析产来看,他是有意把孟、仲、季的资本存

储地分开。可以想见,对于有才干的儿子,这会促使其在理财过程中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只要自己的典铺经营得方,就可以获取更大的收益。再次,对整个家族的典当经营来讲,也可以尽可能地降低个别儿子不作为、“搭便车”所带来的损失,因为其影响所及,不过是他们名下的个别典铺的本银而已。

第三,如果说上述两个方面只是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那么,立足于程虚宇家庭本身的情况,还可以提出第三个原因,这就是:程虚宇家庭的典业经营眼下后继无人,他需要花时间寻找合适的经理人选。

程虚宇在《立分书》的《自叙》中,曾感慨地说道:自己“今年七十有七,感天地覆载之恩,生居人世。但心中所不足者:幼年失恃,壮年丧妻,中年早弃长、次二子,老年未得继”。这“老年未得继”一语和他在之前所提到的“子孙俱已成就”似为矛盾,可以理解为虽然子孙俱已成就,但尚无人足以承担起总理家业的重担。在长、次二子逝后,程虚宇自己“劳碌万状”,可知第三子性灵不足以成为家业总管,而9个孙子也难当此任,是程虚宇自己在管理家业。但他也自知老迈,为家业,尤其是为家中的典铺经营寻找适当的经理人才实为急务。于是在崇祯二年,将其“所有承祖续置产业各典资本开清”,“将各房历年所附本利逐一算明,批还完足”,对各房分授本银10000两,将“基址、屋宇、田地、山塘各项品搭三股均分,请恩亲族眼同写立孟、仲、季分书”,将部分家业均分给三个儿子的家庭。对典当资本采取的尝试性分业和阶段性继业的方法,其本身即具有培养人才的作用。程虚宇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慢慢观察,以寻找合适的家业经管人才。可能对他而言,崇祯二年的析分家产,其最重要目的实在于此。而此前,程虚宇大概是比较放心的,正如他所说的:“丙申,将内外家事付长男赞理,已历二十载,(长男)生平不负一人,不欺一事,厚待周亲,惟天可知。仲男习博士家业。三男训习经理。庶可安逸。”因长男足以托付一切,且有三男为助,所以在崇祯二年前,程虚宇就未曾析分财产让儿子们“试业”。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次男、长男竟先他而去,家业营理变得后继无人,使他不得不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四、崇祯二年典商程虚宇尝试性分业对诸子均分精神的坚持

现在,回到我们讨论的起点,崇祯二年典商程虚宇析分典当资本一事上来。诸子均分精神是如何得到坚持的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时代的遗产继承问题上,诸子均分的精神往往是被要求严格遵守的。像东汉的田真兄弟三人分家,不但“田业生资,平均如一”,就连堂前一棵紫荆树也

“三人各为一份”。典商家庭对于典当资本的继承会有某些特殊性。关于这一点，拙作《乾隆十六年黄炽等立闻分合同 所见徽商典当资本研究》已进行过一些讨论。本文从《立分书》入手，也想就这个问题再谈一点看法。

程虚宇在崇祯二年析分典当资本过程中，向三子家庭各授本银 10000 两，是为均分。但三子年龄不一，为家庭出力状况也非相差无几，若各家授予的钱财相同，实为不均。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按照诸子的劳绩，区别对待。我们由《立分书》可见，为了落实诸子均分的精神，程虚宇在析分典当资本时坚持了三项原则：

第一，起点均等原则。程虚宇向孟、仲、季三房均授本银 10000 两，是为面向未来，为三子家庭以后的发展提供一个同样高度的台阶。而参见他对于生活用品的析分，不难看到，在生活上他也力求使三子家庭保持水平相当。可以想见，作为父亲，在为诸子提供一个均等的发展起点上如果都做不到，当然就难以体现“公心”。但只注重此节，只面向将来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对过去的认可问题。因此，程虚宇在析分资本时又坚持了下面两点原则。

第二，量力授本原则。程虚宇将典铺中所存各房梯己银两算明本利，“谅批”给三房，这本身就有量力授本的意思。三房的梯己银两，如《立分书》所载主要为长辈或亲友赠送的礼俗银两。按汪崇箕先生的理解，这些礼俗银两本利在陆续存入后应该是一直未被动用，到崇祯二年程虚宇才将它们开列出来，分配给各房。三子年龄不一，经历不一，得到此类银两的数量也多少不等。但大体上是孟

房最多，仲房次之，季房最少。而单纯以时间来看，为家庭出力，也必然是孟房最多，仲房次之，季房最少。将他们的梯己银两本利“批还完足”地发放给其家庭，并按照其为分属不同典铺的本银来发放，自然有认可各房过去之“力”，并依据他们出力的大小来提供其发展机会的意思。

第三，量绩授本原则。即根据各房过去为家庭出力的情况发放补贴，而补贴也是以典铺本银的形式发放。由《立分书》所载，程虚宇向孟房发放了 2000 两的补贴（其中 410 两以田产形式给予），理由是：“长男代管家务廿余年，内外悉出其手，毫不私徇，亲疏恬然称庆。微有天幸，并无外费，以致生业日滋。照例贴银贰仟两。”对于季房也发放了 1000 两的补贴，理由是：“三男在家，出入代劳，贴银壹仟两以作加历之资。”只有仲房没有给予补贴，可能是由于次子专心于“习博士家业”，未管家务的缘故吧。

上述三项原则，可看作是程虚宇在析分典当资本过程中落实诸子均分精神的具体体现。

作者简介：郑小娟（1978-），女，福建莆田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 瑞

《御览》卷 421 引《续齐谐记》。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上接第 114 页）事渐兴。管理者利用战争制造的机会舞弊，也不是族田收支管理过程中的常态。随着战争的结束，族田的收支管理又会重新步入有序。

可见，“十家管公九家富”把偶尔、暂时的舞弊现象经常化，把个别宗族具有的现象几乎扩展到所有宗族。不排除这句话被高扬时族田收支管理中的舞弊行为较正常情况下为多，因为族田的收支管理正处于非常时期，不仅刚经历战争，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摧毁了给族田以支持的政府，而新生的政权正准备对其实施毁灭性的一击。但当时的群众把族田收支管理中的舞弊现象放大了，没有真正理清管理者多富这种现象的根源，混淆了族田收支管理中的常态和非常态。

此外，在非常时期，偶然现象的增多使人们很容易把偶然误认为是必然，并且符合宗族所定管理者条件的很大一部分人只能是地富乡绅，人们自然建立起剥削者必

然以权谋私的理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地富乡绅作为管理者是否想以权谋私，关键在于想法能否普遍成行。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地富乡绅等管理者与舞弊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恰恰就是这些人和族众一起创设了严密的管理制度并努力贯彻实施，使得想舞弊者很难得逞。

（本文获得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8120000606。）

作者简介：王志龙（1971-），男，安徽舒城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方 英

《霍邱管氏支谱》卷上《家训·保祭产》、《雍敦堂五房公项老合同》。